

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维度

龚天平, 赵艳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3)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牢固的伦理基础, 是由多种伦理价值支撑的现代化。这些伦理价值主要包括: 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把公正伦理具体化, 因而蕴含着公正伦理; 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物质富足、精神富有, 以此来消解人的异化, 因而蕴含着人道伦理;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诉求, 以善待自然为基本要求, 走绿色发展之路, 因而蕴含着共生伦理; 中国式现代化以世界和平发展为价值诉求, 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为基本要求, 走世界和平发展与自身发展相统一的现代化新路, 因而蕴含着合作伦理。四大伦理都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这一伦理价值原则, 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价值规范体系, 使中国式现代化既奠立于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 也厚植于伦理正当性的基础上。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公正伦理; 人道伦理; 共生伦理; 合作伦理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3)02-0001-10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重要特征, 即人口规模巨大,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既是从具体内容、目标要求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界定, 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路径的总体展示。在这些重要特征中, 人口规模巨大是从量的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规模作出的规定, 它表明, 与其他模式的现代化不同,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现代化, 而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 后四个特征是从质的角度,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内涵作出的规定。从后四个特征中我们可以领悟,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的具体化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牢固的伦理基础, 拥有特定的伦理含义。从理论上揭示这种伦理含义, 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正当

性, 而且有助于我们从实践上有效促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伟大历史进程, 对我们坚持中国式现代化,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的公正伦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22]} 这就意味着, 美好生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目标, 这一目标具体地体现为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没有两极分化三个含义一致的伦

收稿日期: 2022-12-15; 修回日期: 2023-02-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偏好理论与美好生活实现的伦理学研究”(21BZX023)

作者简介: 龚天平, 男, 湖北公安人, 哲学博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伦理学原理、中西伦理思想史、应用伦理、马克思主义哲学, 联系邮箱: tpgd6812@126.com; 赵艳艳, 女, 河南洛阳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伦理学原理、应用伦理

理价值。从这一意义上看,共同富裕就表现为一种伦理价值诉求,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公正伦理。

公正伦理是指一种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诉求的规范伦理类型。按照这种伦理,社会财富和利益要在所有社会成员中平等地分配,或者说,利益分配要平等地顾及所有社会成员,以使这种分配既公平又正义,从而处于协调、均衡、适宜状态。简而言之,公正伦理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利益分配上都能获得一视同仁、得所当得地对待的伦理。公正伦理是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诉求的。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看来,公正伦理所诉求的公平正义并不是抽象的、绝对的、永恒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变化的,它在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形态甚至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人那里都有不同的呈现方式。生产力发展程度,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都是公平正义的制约因素。这就意味着,任何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诉求的公正伦理都不过是对人们经济关系和财产关系状况的反映。如果这种状况合理、恰切,就是符合公正伦理要求的,否则,就是违背公正伦理的。就社会形态来看,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公正伦理。但这两者有着根本区别:前者的公正伦理受制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其公平正义只有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的公平正义,无产阶级因为不拥有生产资料而只能受剥削、受压榨,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因而其公正伦理显然只是形式上的公正伦理;后者的公正伦理建立在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基础上,把公平正义确立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公平正义是普遍惠及所有社会成员的,因而其公正伦理是实质上的公正伦理。社会主义公正伦理主要有如下规定:一是权利平等,这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二是机会均等,这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首要标志和基本条件;三是规则公正,这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必要保障和重要环节;四是结果公平,这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终归宿和实际体现。

共同富裕作为一种价值诉求,是指“共同但

有区别”的富裕,因而它与公正伦理相契合。共同富裕中的“共同”作为富裕前面的限定性词汇表明,它是一个分配问题,也正是这一词汇使此种富裕形态不同于其他富裕形态。如果说富裕是相对于生产力来说的,那么共同则是相对于生产关系来说的,是生产关系之平等性、互惠性的体现。全体人民而非少数人是共同富裕的主体,这就意味着共同富裕是普遍惠及所有人的,而不是特定人群,即所有人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要在所有人而不是特定人群中分配。但是,普惠性并非意味着平均性、同步性,而是意味着共同但有区别。“共同但有区别”与公正伦理是两种看似不同而实质一致的表述。

其一,富裕有区别就意味着富裕不是同步的,不同步才恰恰合乎公正伦理。共同富裕与两极分化是对立的,但也不是同步的。富裕不同步主要有两点体现:一是时间上有渐进性,即区域与区域之间有先后顺序,从部分区域富裕到所有区域富裕是逐步发展的。之所以要逐步发展,是因为目前我国各地的发展状况不平衡,有的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有的地区发展水平偏低,各地区的发展要素也参差不齐。这样一种不平衡的发展就需要支持和激发一部分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合理发挥资源优势,通过技术创新、勇于改革、敢于创业、灵活施策先富起来,然后通过这些先富地区的扶持、带动、支援,使其他地区也富起来。当富起来的地区越来越多,就能实现所有地区共同富裕。二是共同富裕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由低层级到高层级、由不均衡态到均衡态的过程。之所以要动态发展,是因为目前我国不同人群的收入水平具有明显差距。这就要求对收入分配加大调节力度,而且这种调节还必须精准、高效。具体来说,就是扩中(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提低(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调高(合理调节高收入)、取非(取缔非法收入),使部分人群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之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如此才能实现所有人群共同富裕。所有地区、所有人群整合在一起才构成全体人民,只有全体人民都富裕才是共同富裕,也才合乎公正伦理。相反,如果置时间先后、步伐快慢、程度高低等差异于不顾,不切实际地谋求步调一

致的同步富裕,就恰恰与公正伦理相悖。

其二,富裕有区别就意味着富裕不是同等的,不同等也才合乎公正伦理。同等即数量、比例相同,富裕程度同等实即平均主义,平均主义讲究的是分配上整齐划一、数量相同。这显然与公正伦理有本质上的差异,因为公正伦理主张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作为一种伦理观念,平均主义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反复出现,影响深远,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分配上都实行平均主义。平均主义虽有不同表述形式,但其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即主张在所有人中平均地、相同地分配社会财富和利益。简而言之,就是一人一份、人人相同。平均主义并不是追求共同富裕。邓小平说:“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2](155)}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前提的,也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而平均主义则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状况的反映;同时,共同富裕在社会财富和利益分配上还会按付出与获得对等、权利与义务相称的规则,对社会成员的贡献进行考量,也充分考虑机会、过程等因素,但平均主义并不关注这些内容。这就使得共同富裕与平均主义完全不同,而与公正伦理却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共同富裕就意味着公正伦理,公正伦理也意味着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而不同等恰恰是公正伦理的体现和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把公正伦理实践化、具体化,因而是蕴含公正伦理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一个分配问题,但它首先是一个生产问题,因为只有先把社会财富创造出来,把“蛋糕”做大,人们才拥有可分配之物。人们也只有首先拥有物质财富,才能从事其他活动。生存是“任何文化中、任何个人行为的前提条件……构成了最基本的人类需要……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行为者才能有效地参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实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3](69)}。要物质富裕,就需要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根本目标上说高度统一,从内在逻辑上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实践上说彼此支撑、同时并举。高质量发展是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28)}的发展。其根本原则是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目标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这个目标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只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立于雄厚的物质基础上,也才能实现生产力发展的新跃升,提升全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水平,为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高提供坚强后盾。而全体人民在物质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再去追求精神生活富裕,比如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与技能培训、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欣赏艺术等,就能为高质量发展培养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高素质人才又能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使高质量发展具有强大的动力基础。因此,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密切相关,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又是公正伦理的基本价值诉求。这样,高质量发展就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践履公正伦理的根本路径。

二、消解异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人道伦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1](22)}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或者说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实现人民在物质生活上富足宽绰,而且要实现人民在精神生活上富有充实。也只有实现物质富足、精神富有,人们才不会沦为异化的人。因此,通过促进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来消解人的异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人道伦理。

人道伦理是指一种视人为人、尊重人的伦理价值原则,它主要表现为提倡人的尊严、尊重人

的价值、重视人的幸福、追求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人道伦理指向人的非异化处境。人的异化导致人的创造物控制和奴役人,因而与人道伦理相悖。异化是指人和其创造物所处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体现为人创造出来的东西不为人所支配,而人反被这些东西所支配和奴役。简单地说,异化就是人为物役,而非物为人驭。异化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当然,它并非马克思首创。18世纪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了诠释人和社会、国家的关系,在政治权力转移和国家产生的意义上使用过异化,此即所谓政治异化;19世纪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曾经为了说明绝对精神的外化,在主体与客体分离、对峙的意义上使用过异化,此时异化正式成为一个哲学范畴,此即所谓劳动异化;同样是19世纪,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哲学家曾经为了解释宗教作为人的创造物非但不为人服务,反而作为一种异在性的东西来控制、压抑人的现象,在人的自我分裂的意义上使用过异化,此即所谓宗教异化^{[4](118)}。与这些思想家既有联系但又相区别,马克思也深入研究了异化问题。他在批判性地考察和继承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思想的基础上,从人的本质出发来观照异化。在他看来,异化即人的非人化,是人的本质的丧失。它表现为“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5](537)}。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劳动,即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但是,私有制使劳动不属于人的本质,而变成相对于人来说的外在的东西,使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5](159)}。这就是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把作为目的的人的自主自由的活动贬低为手段,导致“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5](163)},即劳动产品、劳动活动本身、人之作为人的类本质与

劳动者相异化,人与人也相异化。总之,马克思认为,劳动本身应该是人类为解放、发展自身,实现自身本质的自由活动,但私有制使劳动与其创造的结果之间出现背离,物的世界的增殖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代价。人的世界的贬值表现为人的畸形发展、片面发展即人的异化,这显然与人的自由自主本性及其全面发展诉求背道而驰,因而不合乎人道伦理的。

与人道伦理相悖的人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现代化在一般意义上是指“以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为动力,以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为依托,以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城市化为标志,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发展进步的社会化过程”^{[6](111)}。但从根基性意义上说,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历史以来,现代化出现过几种模式,比如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北欧模式、莱茵模式、东亚模式等,虽然他们各有千秋,但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当然,现代化首先也是以资本主义形式开启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对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一方面把人从“人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向“物的依赖关系”转变,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7](52)},这是人的发展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人处于“物的依赖关系”中,而“物的依赖关系”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物质形态,这种形态的所有制从根本上束缚人、扭曲人、强迫人,导致人的异化。因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之所以异化的根源,同时也是劳动异化的结果。“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5](186)}除了私有制,导致人异化的根源还有旧式分工。马克思说,旧式分工告诉我们,“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5](537)},而旧式分工与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5](536)}。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旧式分工相结合,就构成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资本所呈

现出的反映资本主义客观现实活动的内在联系、运行轨迹、发展趋势。”^[8]其实质就是资本的自我增殖逻辑、为追逐剩余价值而在全世界全面扩张的逻辑,在这种逻辑宰制下的现代化一定会造成人对物的依赖及其异化,即资本从“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7](43)}。因而,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具有相对于前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进步性,但它也同时导致人的异化这一必然结果。

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来消解人的异化,因而是蕴含人道伦理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现代化模式中的一种类型,同样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因而它具有各国现代化包括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这种特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也不能摆脱对资本的利用,因为资本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7](90)},创造了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发展了社会关系。资本逻辑一方面“把人从不应有的贫困和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独立的个体”^{[7](90)},所以中国式现代化要利用资本;另一方面“人的这种解放又因资本逻辑而被剥夺,独立性和个性为资本所有”^{[9](119)},即人的异化,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又要驾驭资本,把资本控制人转换为人控制资本,即消解人的异化。要消解人的异化就要把人的发展逻辑置于优先地位,以人的发展逻辑引导资本增殖逻辑。也就是说,通过利用资本逻辑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雄厚的物质财富,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此即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同时,又以人民需求为导向,驾驭资本,使其既能“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又能服务于人,“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10](466)}。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能“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1](652)}的优越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的片面发展、畸形发展,人为物所役等异化现象将被消除,人的

全面发展得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发展的一种普遍且自由的状态,具体来说,是指人的劳动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社会关系得到丰富拓展,自由个性得到充分展示。全面发展的人既不依赖于他人,也不依赖于物,同时又摆脱了贫困和恐惧。总之,全面发展的人就是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富有的人,就是尊严、价值、人格都能充分彰显,幸福能得到实现的人,这正是人道伦理所内含的核心价值原则。在这种意义上看来,以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与人道伦理相契合的现代化。

三、和谐共生: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生伦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23)}这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诉求,以善待自然为基本要求,走的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道路,因而这种现代化新模式蕴含着共生伦理。

共生伦理也是一种规范伦理类型,是指以人与外界共同生活、和谐共荣为核心价值取向的伦理原则。其基本内涵有如下几点:其一,共生意识是共生伦理的精神条件。“共生”一词,英文为 symbiosis,来源于希腊语,本意是指共同生活,即“两生物体之间生活在一起的交互作用,也包含不相似的生物体之间的吞噬行为,意义可扩大为指不同种属生活在一起的状态”^{[12](1)}。共生本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它表明的是生态圈经过长时间的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变成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其中难以计数的生物、非生物都各显精彩,展示出复杂多元但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这种发展状态使人与自然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即人类要靠自然才能生存,自然也因人类而拥有意义。当人类用思维去把握这一生命共同

体时就形成人类特有的共生意识。共生意识的关键就在于“共”和“生”，具体来说，就是“在大自然这个造物主面前，一切生物与非生物都是平等的，所有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所有生物只有在和他物的关系中，才能够确立和维护自身的生存”^{[12](74)}的意识。张立文先生说：“人类和一切生物、非生物，都由自然而生。至于生物、非生物的自身的差分，而形成彼此的差异，又与外缘内因相联系。自然制造了人的生命，而又异化了人，人成为自然的主宰者；人亦制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主宰、支配人的生命。在这种互动中，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应建构共生意识。”^{[13](394)}但是，共生并不是对事实的简单描述，而是一个带价值判断的厚事实概念。因此，共生意识又是带有伦理因子的意识。正是由于共生意识带有伦理因子，因而它就成为共生伦理的精神条件。其二，和谐共生是共生伦理的价值指向。共生伦理并不只表现为共生意识，只有当共生意识转化为人们行为选择的指导，共生伦理才能形成。共生伦理作为一种伦理，总是以和谐、有序等价值为表现的，因而共生伦理就以和谐共生为价值指向。张立文把和谐共生简称为“和生”。在由人类和自然组成的整个生态系统的意义上，他认为，和生“是以‘地球村意识’与‘太空船意识’为基点和基础的”，“各民族、种族、国家、社会、文化、他人以及贫富、集团之间，都应在融突中和生，和生才能共荣共富”^{[13](394)}，如果通过单向剥夺自然、他人、其他群体、其他文化，使其灭亡，那么剥夺者自身也会灭亡，最终世界也走向灭亡。当然，和谐共生并不是说没有竞争，而是这种竞争以和谐、融合为价值导向，从而走向荣富与共。荣富与共就是各竞自由、繁荣兴旺但又秩序井然、和睦相处的状态，这种状态即为共生伦理的具象化呈现。

共生伦理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就是要求人类善待自然。人类之所以要善待自然，是因为人类生存和发展与自然息息相关，也是因为自工业化、现代化以来，人类对大自然采取征服、掠夺的行为，大自然已然无法承受，生态危机频发，对人类提出严重警告。2017年，一项名为“为什么花了25年的功夫，我们还是不可持续？”

的研究，对1992年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峰会的影响做了评估。编辑迈克尔·豪斯及其团队对来自全球各地包括发展和发达国家的94项行动报告进行研究发现：“从1970年来，生物多样性减少了50%以上；人类生态足迹提升显著，几乎需要1.6个地球才能满足我们日常的资源消耗；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将近一倍；这一时期，世界失去了超过48%的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世界人口和人均资源消耗量增长了一倍以上。”^{[14](75)}所以，人类如果还不醒悟，肆意妄为，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家园的大自然将不复存在。人类需要创造新思维、新哲学，这就是共生伦理，而共生伦理又需要人类善待自然。善待自然主要有如下含义：其一，尊重自然而非控制自然。作为自然之子，人类时刻都不能离开自然的滋养，因而不能认为自己优越于自然，应该尊重自然而不是控制自然。控制自然意味着要让大自然为了人类的方便，以有利于人类的形式存在，这其实是以低级幼稚的生物学和机械论哲学为基础的，是人类妄自尊大的想象的产物。人类因为具有主体性，在自然面前虽然不是无能为力的，但也无法控制自然、让自然听命于人类。人类与自然只能构成命运相互交织的共同体，因而人类必须尊重自然，自觉维护大自然的平衡与和谐，才能有利于人类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其二，认识并合理利用自然规律。规律即事物和现象运动、变化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它决定着事物和现象发展的必然走向。大自然作为一个生物和非生物有机联系着的整体性的生态系统，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人类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当然需要开发、改造自然，但开发、改造行动必须以认识、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只有在此基础上合理利用规律，自然才能可持续性地服务于人类。否则，人类必定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人类也只有正确认识规律，再合乎规律地开发、改造自然，才能与自然和谐共生。正是在此意义上，莫斯科维奇把正确认识规律、利用规律当作一个并非纯事实性而是具有伦理意义的行为规则。他说，人类要“从什么是合乎伦理的，以及什么是伦理上的权利，同时什么是经济上的应付手段的角度，去检验每一个问题。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

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15](163)}。

中国式现代化以绿色发展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而是蕴含共生伦理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谐共生是共生伦理的基本价值诉求。共生伦理不仅要求善待自然,也要求保护自然,更要求人们在行动上切实实践履。中国式现代化践履共生伦理之道就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主要有以下内容:其一,在发展方式上向绿色转型。发展方式是指通过数量增加、结构改变、质量优化等生产要素变化来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方法和模式,主要包括:一是生产方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国家经济实力大幅跃升。但同时也存在片面追求高速度、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从以速度为中心的外延式转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内涵式,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的发展方式。绿色发展方式以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各类资源能够节约集约利用、废弃物能够循环利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健全等为特征,以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为支撑。二是生活方式。这主要体现为绿色低碳消费成为生活风尚。其二,推进污染防治。污染防治是整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恶化,预防可能造成的环境条件恶化风险的行动。我国在单纯追求高速度发展过程中,空气、土壤、水资源、城乡人居环境等都受到严重污染。环境污染不仅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着严重威胁,也使人们的生活成本增加、生活质量降低,因此必须加强污染防治。除此以外,绿色发展还包括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得到全面提升,碳达峰、碳中和得到积极稳妥推进。总之,绿色发展就是经济社会绿色化、低碳化的发展,它既是高质量的发展,也是坚持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相统一、生态优势就是发展优势等价值观念的发展。这种发展必定能够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而彰显其共生伦理意蕴。

四、和平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合作伦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1](23)}这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世界和平发展为价值诉求,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为基本要求,拒斥西方式现代化的战争、殖民、掠夺老路,选择与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规律相适应,世界和平发展与自身发展相统一的现代化新路,因而这种现代化蕴含着合作伦理。

合作伦理是一种以和平发展为价值诉求的规范伦理类型。按照这种伦理,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的交往在不排斥竞争的同时,应该遵循和平价值观念,以合作优化相互关系,谋求共同发展和进步。其基本内容有如下几点:其一,和平意识是合作伦理的精神前提。和平即和谐平等,意味着双方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相互包容,在处理事情时采取平等对话与合作的方式。和平作为一种观念,虽然是对一种事实状态的描述,但它实质上是一种伦理意识。曹刚认为,和平意识的伦理基础就在于“生命共同体的共生连带关系”^[16]。和平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精神。中国古代“和”文化强调,不仅人与人之间要以和相处,群体之间要以和相待,国际之间也要协和万邦。《尚书·尧典》中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协和万邦意指以公正、温和的态度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处。当人际、群际、国际之间以和平意识相互对待,合作伦理便得以形成。因此,和平意识构成合作伦理的精神基础。其二,发展进步是合作伦理的价值诉求。合作伦理还需要个人、群体、国家等主体的行为践履,才是有意义的伦理,而不同主体的不同践履,其价值诉求是不同的。比

如个人对合作伦理的践履是为了德性提升和人格完善,群体对合作伦理的践履是为了团结增强和形态健全。而从国家层面看,合作伦理的价值诉求则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发展进步是当今所有社会都追求的基本价值。但一段时间内,人们把发展进步等同于经济增长,这显然是对其作了极为窄化的理解。著名福利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要以自由看待发展进步,认为发展是“作为自由的发展”,即“发展……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17](1)}。这种发展观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这是一个规范性命题,意味着必须以人们拥有的自由是否得到增进作为评价发展进步的首要标准,此乃置自由于发展之中心地位的“评价性原因”;二是“自由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这是一个实证性命题,意味着“发展的实现全面地取决于人们的自由的主体地位”^{[17](2)},此乃置自由于发展之中心地位的“实效性原因”。两层意思综合在一起,就意味着自由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阿马蒂亚·森的发展观的确极富创意,虽然他主要是针对个人来说的,但这种发展观对于国家也是适用的,因为民主自由既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同样也是国家追求的基本价值。国家谋求以自由为目的的发展进步,只有合作才是有效途径,而合作伦理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精神力量。

在伦理学意义上,合作是人之为人的伦理特性,是人们交往的一种基本形式,表现为在某一共同目的驱动下的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采取一定方式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联合行动。如果以抽象思维来考察人,我们可以把人的存在样态概括为三种,即个体、群体、类。但是,类是指人类,是放大的群体,而合作也只是人类才有的行动。因此,按照类型划分,合作总体上说就只有人际合作和群际合作两种。合作伦理也就是这两种合作中合作主体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的总和,这种规范的核心精神就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合作伦理体现在国家层面就是相互交往的国家之间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即团结合作、相互支援、优势互补、共赢共进。因为国家也是一个群体,国与国的合作也属于群体合作。国家作

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群体性存在形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不仅国家内部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外部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关系性存在,就意味着任何国家从根本上说都并非存在于一个相互区隔、相互对峙的世界,而是存在于一个相互构成、相互成就、相互关联的世界,意味着任何国家都需要与其他国家以和相待,而不能视之为敌,拒斥对方。张立文创建的和合学主张“通过对话、交流、互动、谈判来化解冲突,实现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落实合作共赢,同舟共济。在政治上应该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经济上应该互利共赢,优势互补;文化上应该互相借鉴,和而不同;安全上应该互相信任,互相帮助”^[18]。这是系统全面又非常深刻的洞见,给人极大启迪。虽然国与国因各自具有自己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地域特征、人口规模、社会制度、伦理道德而具有差异性,但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性就需要相互往来,相互往来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相互联结在一起,无法真正离分,从而互为意义、相互有利、共存共荣。当然,合作伦理也并不排斥竞争,但它强调合乎伦理即义利并重、讲究信义情义正义、遵守游戏规则的正当竞争。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世界和平发展与中国自身发展同频共振,因而蕴含着合作伦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的一条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道路。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世界和平发展。“中国式”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中华文明气质的中国话语,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文化、中国主体等概念的高度浓缩。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而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与此对应,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因为主要以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因而可以简称为西方式现代化。西方式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根基,表现为一个侵略扩张、殖民掠夺、奴役盘剥的历史发展过程。资本向世界各地的全面扩张,致使西方式现代文明对一切传统文明构成残酷侵略,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人民

置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并使这些国家和人民陷入越来越贫穷的处境。因此,西方式现代化秉持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6](138)},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与此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行动逻辑,也利用资本来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文明,但只是把资本当作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手段,而不是向世界其他国家扩张的工具。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相互尊重、公平对待的原则与其他国家开展交往,尊重其他国家人民自主选择适合其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支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各国内政外交自主自决、不受他国干预,支持各国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安全保障共建共治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不搞零和博弈,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以多边主义和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以对话协商、和平方式而非武力对抗、不当结盟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争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既通过争取世界和平环境以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粉碎了西方式现代化“国强必霸”的强权神话。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合作共赢。西方式现代化是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理论基础的现代化。这种意识形态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系统化、理论化,逐渐演化为一种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理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又把这种现代化理论当作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唯一标准,认为其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终极性。在这种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西方式现代化,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凭借迅猛发展的科技力量的助攻,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集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多种霸权霸道霸凌于一身的现代化模式。西方式现代化在全球各地恃强凌弱、巧取豪夺,以致给世界带来深重危害。与此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意识形态划分国家阵营,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和正确义利观,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致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合作共赢旗帜,建设一个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现代化,它既主张世界

和平发展,又谋求自身发展,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合作伦理的核心价值理念,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对合作伦理的生动践履。

五、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它不仅全方位地涉及党的领导、根本制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平发展、文明形态等,而且具体化地呈现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科学方法、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同时也遵循各国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从伦理学角度来考察,中国式现代化是由多种伦理价值支撑的现代化,这主要包括: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突显社会公平正义,因而蕴含着公正伦理;以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来消解人的异化,因而蕴含着人道伦理;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诉求,以善待自然为基本要求,因而蕴含着共生伦理;以世界和平发展为价值诉求,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为基本要求,因而蕴含着合作伦理。其中,公正伦理和人道伦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国内维度的伦理价值生态,前者是中国式现代化行进在公平正义轨道上的伦理保障,后者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人民本位而非资本本位的人本逻辑;共生伦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人与自然维度上的伦理价值生态,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以绿色价值为底色的现代化;合作伦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维度上的伦理价值生态,是中国式现代化行进在和平发展轨道上的伦理护栏。四大伦理都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价值立场,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价值规范体系。所谓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是指时刻牢记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服务人民当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中心点、落脚点的价值立场。之所以要坚持这一根本立场,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自觉性、主动性的现代化。公正伦理、人道伦理、共生伦理、合作伦理都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定位于满足人民群众的期盼,坚持依靠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现代化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根本价值立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原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方

法论,是我国目前最能取得广泛共识的公共精神,因而它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伦理价值规范体系,也统领上述四大伦理价值。正是这一伦理价值规范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既奠立于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也厚植于伦理正当性的基础上,从而既经得起历史尺度的衡量,也经得起道德尺度的评价。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3] 莱恩·多亚尔, 伊恩·高夫. 人的需要理论[M]. 汪淳波, 张宝莹,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4] 高文新. 马克思理论基本范畴研究[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7.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6] 戴木才, 等. 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之道: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8] 张雷声. 论资本逻辑[J]. 新视野, 2015(2): 14-20.
- [9] 颜晓峰, 等.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12] 罗安宪. 和谐共生与竞争博弈[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8.
- [13] 张立文. 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 上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14] 魏伯乐, 安德斯·维杰克曼. 翻转极限: 生态文明的觉醒之路[M]. 程一恒, 译.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8.
- [15] 王泽应. 伦理学原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 [16] 曹刚. 论和平主义[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5(4): 63-68.
- [17]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 任贇, 于真,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 [18] 张立文. 和合外交与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议[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3(11): 14-21.

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GONG Tianping, ZHAO Yanyan

(School of Philosoph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a deep and solid ethical foundation, which is supported by a variety of ethical values. These ethical values mainly include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omotes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with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the people, and embodies the ethics of justice with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nomy. Second, by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enriching of things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chieve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wealth to dispel the alienation of people, which thus contains the humane ethics. Third, Chinese modernization takes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as the value pursuit, treats nature well as the basic requirement, and takes the path of green development, which contains the ethics of symbiosis. Forth, China's modernization takes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as its value pursuit and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as its basic requirement, and pursues a new modernization path that integrates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with its own development, which thus implies the ethics of cooperation. The people-centered ethical value principle runs through all the four ethics, constituting the ethical value standard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hich mak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not only based on the universal law of huma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but also firmly rooted in the ethical legitimacy.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thics of justice; ethics of humanity; ethics of symbiosis; ethics of cooperation

[编辑: 胡兴华]